

艰苦创业 改革奋进

迎接东西湖垦区光辉灿烂的未来

——在东西湖垦区围垦建场三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洪耀忠

一九八八年四月

艰苦创业 改革奋进

迎接东西湖垦区光辉灿烂的未来

——在东西湖垦区围垦建场三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洪耀忠

同志们：

1958年4月上旬，东西湖大堤竣工，东西湖垦区全面投入生产，时间已过去三十周年，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日子。为了回顾东西湖人民三十年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总结三十年来特别是改革九年多来国营农场建设的经验，加快和深化改革，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美好的未来，我们垦区的新老农垦战士、十八万人民隆重地进行一系列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在这里，我代表东西湖区委、东西湖区人民政府、东西湖农场管理局、东

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向为垦区作出过贡献的老一代农垦战士、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职工和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纪念围垦建场三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历程。东西湖垦区是党的“八大”路线的产物。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党政组织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早在东西湖垦区设计规划时，以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运筹决策，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亲自审批《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计划任务书》。在围垦期间，国务院批转军委批准武汉驻军一个师的官兵参加围垦义务劳动。在垦区的生产起步阶段，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给垦区极大的优惠。李先念、谭震林、王震、伍修权、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垦区视察、指导工作。

三十年来，垦区两代人艰苦奋斗，已经把—个满目荒凉、瘟疫横行的荒湖建设成为物质基础雄厚，技术装备先进，“农、林、牧、渔、副、工、商、建、运、服”多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垦区。

东西湖垦区原是古云梦泽沉睡千年的荒湖。

芦苇丛生，钉螺遍地，人烟稀少，每逢汛期泛水为患；枯水季节一片荒凉。历代统治者残酷盘剥湖区人民，苛捐杂税，灾害往复，民不聊生。血吸虫患病率达80%以上，死亡率达10%。1920年以后，曾有五次围垦汉城垸。但有的是反动统治者打着“为民兴利”的幌子，把围堤捐款挥霍殆尽，事成泡影；有的是有识之士多次为民请愿，要求围垦，因得不到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半途而废；有的是官绅富豪相互争名夺利而告失败。1944年，人民再三要求围垦，反动统治者竟以“一利而有十害”为理由给予否定。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湖区人民的疾苦，决定围垦这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50年起多次实地勘探；1955年长办勘测设计院编拟方案；1957年5月中央批准《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计划任务书》，国家计委将东西湖围垦工程列为国家“二·五”计划和湖北省1957年重点水利工程，投资三千八百万元围垦建场；1957年8月成立了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筹备委员会；1957年10月成立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东西湖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终将实现。只有共产党才能实实在在的为人民谋福利。

开发东西湖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国营农场群，发展城郊农业，保证城市人民的副食品需要，保证武汉市不受洪水危害，消灭血吸虫病，为农林、水利、畜牧等科学研究和示范创造条件。东西湖围垦建场的壮举，不仅可以与当时荆江分洪工程、汉江分洪工程、武钢和武汉长江大桥媲美，而且是我国以至世界上大城市近郊少有的大型国营农场群。

1957年10月15日，经过组织上、思想上、物资上、人力上的充分准备，东西湖围垦工程正式动工。东西湖围垦指挥部由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任指挥长兼政治委员。下设八个分指挥部、一个义务劳动指挥部和一个建闸工地指挥部。湖北孝感、黄冈和河南开封、商丘地区共十二万围垦大军，投入了艰苦卓绝的围堤战斗。有的河南民工为了支援东西湖围堤，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当地乡政府满足他们支援湖北建设的愿望。武汉市各级党政机关、厂矿企业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大专院校师生、驻军指战员纷纷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四个月内，共有十多万人次分期分批参加围垦义务劳动。

围垦工作十分艰巨。天寒地冻，给施工和生

活带来了困难。在一百多里长的围堤工地上，荒滩上搭起了工棚，泥泞中踏出了道路，唯一的水上运输线捷径河已临枯水季节，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但是，十多万劳动大军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提出“小雨不停工，大雨不放松”，“起早贪黑、快马再加鞭”，“与洪水争时间，向荒地要粮”等战斗口号，忘我地战斗在工地上。勇士们抗严寒、顶风雪、夜以继日，掀起围垦建设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高潮，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英雄模范，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河南民工不远千里而来，一到工地即连夜召开党团员动员会，察看施工现场。动工那天，有的民工不等天亮就从被子里爬起来，连夜整理工具。施工中，绳子不够，就用绷带和腰带，工具不够，有的人就把衣物当箩筐装土，打着赤膊用手捧泥。河南民工开始不适应本地水土，加上劳动量大，条件艰苦，不少人病倒。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不能干重活的就干轻活，坚持不离开工地。汉阳指挥部民工开展“比质量、比工效、比团结、比节约、比安全”的劳动竞赛，提出“放工三担土”的口号，提前九天率先完成围堤任务。全线干部戴着袖章参加工地劳动，自觉接受民工监

督。中南话剧院院长是参加过延安大生产的老干部，不顾年老体弱也参加了围垦义务劳动。武汉驻军十四个大单位的义务劳动大军，二十四天开挖鱼池五十二个，修筑堤坝土方达二千二百多方，几百名将校军官筑成二千米长的“将军路”。上甘岭战斗英雄赵毛臣以及不少长征老干部、红军老战士参加了义务劳动。东西湖围垦，牵动了城市人民的心，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关怀。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全体代表向围垦工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省卫生系统抽调大批医务人员支援，武汉市交通运输部门及时把大批围垦物资运到工地。1958年4月上旬，经过十余万民工和义务劳动大军的努力奋战，东西湖围堤工程终于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基本竣工。据纪念碑碑文记载，围堤工程历时四个半月，工程总计土方一千五百七十五万七千余立方，混凝土四千八百余立方，石料二万四千五百余立方，大堤长五十三点五七公里，防洪排渍闸长二十七公尺，排水总干渠长七点六公里。东西湖大堤的筑成，宣告了东西湖人民长期受洪水危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历代统治者办不到的事情，在社会主义今天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一个亘古未有的崭新

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湖垦区诞生，表明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征服灾害，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为此，1987年冬，中共东西湖区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以东西湖围垦大堤建成之时——4月上旬（具体定为4月4日）作为建场纪念日。

在围堤工程开始的同时，垦区开荒的序幕也拉开了。“东西湖开荒指挥所”于1957年10月成立。中央农垦部提出了“边围垦、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的方针。在漫无边际的沃野上，机声隆隆，拖拉机耕过齐膝深的湖草，沉睡千年的沃土得以新生。开荒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忘我劳动。到1957年底，开垦荒地九千余亩，适时播种了夏粮和蔬菜。1957年12月28日湖北省编制委员会〈57〉编办字第863号文批准成立“武汉市国营农场管理局”，方敬之同志任局长兼书记。1958年3月9日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58〉组甲字第17号文任命各农场的场长、书记，垦区正式成立六个畜牧场、三个蔬菜场、五个粮棉场和一个养殖场。委派一批老干部任农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为争取当年受益，全区干部职工抓季节、抢农时，积极备耕。干部职工在沼泽荒滩上开挖排灌沟渠，修筑道路，建设生产、

生活基地。1957年11月，四百三十头内蒙奶牛到垦区牛奶场安家落户；1958年1月，水产养殖场投放鱼种六百三十万尾；1958年2月，第一批十四万斤马铃薯种在祁家山第一蔬菜场下地；1958年4月，八百一十五只来亨鸡和澳洲黑鸡在第一畜牧场孵化出来。1958年春一举开荒并播种十四万七千多亩。当年生产粮食二百六十七万斤，棉花三点三六万担，蔬菜六千一百五十一万斤，牛奶二十九万斤，生猪二千五百头，鲜鱼一百六十九万斤。垦区为武汉市人民作出了第一次奉献。同时水利和园田化建设加速了灭螺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沧海变桑田，昔日荒湖成为鱼米之乡。

1958年至1966年，是东西湖垦区奠定经济发展物质基础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内，垦区虽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反右倾”、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路线的干扰危害，由于垦区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坚决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力求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讲真话，从本地实际出发，于1962年制订了劳动、农机、耕牛、财务等经营管理细则，1963年起，又探索用“三包一奖赔”为基本内容的经营管理办法，解决场与队，

以及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促进了垦区建设。196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六千一百七十六点六万元，粮食总产量达二亿零五百万斤，上交原粮七千一百五十万斤，棉花总产量达九点零一万担，单产达一百三十四斤，创历史最好水平。1960年，是经济困难时期，为弥补粮食不足，根据市委指示，垦区实行“以菜为纲，粮食自给，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蔬菜面积一度达到二十万亩，总产达三亿七千四百多万斤，垦区生产的各种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往武汉，以菜代粮，为武汉市区人民抗灾度荒作出了贡献。随着全国经济的好转，1962年垦区改行“以粮为纲、粮菜并举、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粮食播种面积，比1960年增长55%，总产增长60%，结束了每年吃国家供应粮二千多万斤的历史。由于粮食有余，又为畜牧业、食品加工业提供了原料。在此期间，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开垦荒地二十八万五千亩，园田化建设、排灌沟渠初成体系，各项水利配套工程相应建立，农业机械占有量和农用化肥使用量达到一定水平，居民村（点）建设迅速发展，水陆运输形成网络。

“十年浩劫”期间，垦区经济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六千一百七十六点六万元下降到四千零九十七点六万元，下降33.8%。全年亏损一千三百九十七万元；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二亿零五百万斤，下降到一亿一千一百万斤，下降45.6%，单产由七百一十四斤下降到三百五十六斤，下降50.1%；棉花单产由一百三十四斤下降到六十三斤，下降53%。1967年到1975年，九年共亏损三千六百六十五万元，平均每年亏损四百零七万元，每年减产粮食四千万斤。然而，具有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东西湖垦区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坚守劳动岗位，坚持生产建设，不计个人得失，默默无闻地为垦区建设奉献光和热。在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垦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由1969年的最低点逐渐回升，到1976年，达一亿一千七百万万元。1966年，垦区曾向市申报兴建纺织厂和油厂的计划，并得到批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计划推迟三年到1969年才开始动工，1971年投产，1973年全部建成。同时兴建的还有糖厂。这一批工业企业的

兴建，历尽艰难，为垦区工业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农场只能单纯搞农业的框框，从经营思想上打开了思路，带动了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化工、建材、机电等行业的发展，改变了垦区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0年的13.9%上升到1975年的59%。1975年工业总产值五千零八十万元，创利税一千三百五十万元。

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经历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党中央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东西湖垦区也进入经济高速发展，各项事业突飞猛进，改革形势振奋人心的最好时期。

垦区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和肃清各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逐步认识到自己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认识到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垦区不改革没有出路。于是，在省、市委和区委的正

确领导下，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改革洪流中。

1979年经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批发文件，批准我垦区试办全省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副食品生产为中心，农工商一体化，为城市人民服务”的经营方针。农工商综合经营，改变了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使农、工、商、建、运综合经营，协调发展，很快实现农业增收，加工增值，商业减少环节增利和经济联合增益的综合效益，被评为全国农垦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嘉奖。1981年垦区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38%，工业利润增长一倍，商业营业额增长二点二倍，商业利润增长二点六倍，再次受到中央农垦部的嘉奖。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委许多领导亲临垦区，与区、场领导共同研究制订了搞好农工商一体化的战略决策和发展蓝图。

与此同时，垦区在1979年停止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作法。通过调查研究，组织农工座谈，证明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倒退，农户多养几头猪不是资本主义，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开始解冻。1980年区委制订了76号文件，试行农业生产

责任制。1982年，在部分农场和大队试行土地承包到户，家庭承包经营。1983年至1984年在全区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使农民蕴藏的劳动热情迸发出来了。1985年垦区按照赵紫阳同志提出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改革思路，全区建立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九百零二个，后来又把专业户和一般承包户均纳入了家庭农场管理体系；同时进一步在渔、牧各业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由于兴办家庭农场，加速了农业劳力分离，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为了加强农业基础，1985年起，全区实行减轻农工负担的政策。采取减少管理费、取消不合理的摊派提留，实行以工补农和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环节增加服务费用等措施，平均每个农工每年减轻不合理负担达一百二十多元。同时提高了农工退休待遇，对建场以来不同时期参加生产建设，为农场作出过贡献的退休农工，增发退休工资，全区年增发二百零六万元，每个退休农工每月退休费增加二十至三十元。减轻农工负担和提高退休农工待遇，对稳定农业基础，调动农工的积极性起了巨大作用，激发了农工爱场建场和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为了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实现富裕农村、服务城市的目的，垦区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根据农业区划提出的科学依据，对全区土地、山林、水面按五个综合农业区进行规划。在保证粮食稳步增长（稳定粮食面积二十万亩以上，粮食总产在二亿二千万斤以上，人均占有粮食一千三百斤以上）的基础上，将标高在海拔20米垦殖线以下的低产冷浸田，还湖种藕养鱼。不仅注意从量的方面调整生产布局，还从质的方面优化产品结构。根据地处大城市近郊的特点，坚持以副食品生产为中心，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按鱼、奶、肉（猪、禽）、蛋、菜、果、杂的序列，大力发展鲜、活、嫩、名、优、特等商品性强的产品供应城市。经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副食品多种经营产值所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84年的58.9%上升到1987年的66.2%。

为了改变垦区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三办”（队办、联办、个体办）企业。1985年以来，垦区提出“三办”企业在经营方向上，以种、养、加为主；在所有制形式上，以合作、联办、

民办经营为主；在劳力组合上，以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待业青年为主；在资金来源上，以集资、自筹为主的“四为主”方针，学习外地经验，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的道路，形成独特的模式。到1987年，“三办”企业发展到四百三十九户，从业人员达五千五百多人，“三办”工业产值达四千四百二十万元以上，占工业总产值的12.2%，产生年队办工业产值五十万元以上的大队（村）十九个，一百万元以上的大队（村）十个。兴办“三办”工业，使农业富余劳力各得其所，繁荣了城镇，富裕了农村。

为解决家庭经营和社会服务“两张皮”的问题，垦区建立健全了种苗、科技、植保、防疫、饲料、农机、销售等服务体系，为农业服务的网点达二千五百多个，形成了区、场、大队、生产队、专业户多层次的服务网络，为家庭经营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促进了垦区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区服务网点逐渐由单纯的经营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化，由单项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化，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产供销一条龙综合服务体系。

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围绕提高农业生

产力，垦区还对土地、山林、养殖水面实行分等定级，开展更高层次的招标承包，引导农户增加劳务、资金和技术上的投入。同时，在种植、养殖业生产上推行规范管理，如按养鱼工艺设计要求，开展“万亩千斤”攻关活动；进行“双纲田”、“吨粮田”科学示范等。在流通领域，改革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组织农工进入流通，对粮食继续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双轨制”。

为把农业联产承包的成功经验推广运用到工业企业，从普遍推行“一包三改”，解决企业不吃国家大锅饭和职工不吃企业大锅饭入手，发展到扩大企业自主权，完善企业动力机制，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到1987年底，全区一百一十家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承包经营的有七十八家，实行租赁经营的有二十二家，实行股份制联营的有五家，其中有一百家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加速了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改革的深入，广泛开展了垦区内外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领域、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横向经济技术联合和协作。垦区建成各